



复旦文史专刊之四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 世界史中的 东亚海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 /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 —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12

(复旦文史专刊)

ISBN 978 - 7 - 101 - 08083 - 4

I. 世… II. 复… III. 海域—历史地理—东亚—文集  
IV. K931.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1154 号

- 
- 书 名 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  
编 者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执行编者 朱莉丽  
丛 书 名 复旦文史专刊  
责任编辑 李 静 胡 珂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mailto: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¼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083 - 4  
定 价 39.00 元
-

# 跨国史视野下的东海研究

杜春媚(美国·西肯塔基州立大学历史系)

## 引言:全球史的兴起

现代史学在西方是同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一同成长起来的。这在先天上就造成了历史将解释民族国家的生成、发展和衰落作为责任,各种历史著作和教科书自觉不自觉地 为民族国家的存在提供着合法性的说明。19世纪以来主导史学的国别史(national history)在教学和研究中居于主流,将民族国家看成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并且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研究单位和最终落脚点。目前历史系的专业设置和历史学家的主要划分大多还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范畴内。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显得越来越脆弱。如果说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民族国家是被建构的、想象的产物<sup>①</sup>的时候,这个想法还有点骇人听闻,今天却已经成为了街头巷尾的流行语。尽管学界的共识还没有达成,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民族国家在理论上已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这个长期以来公认的“实体”受到了各种跨国势力的挑战。比如说像欧盟、联合国、路透社等跨国组织和企业;女性主义、环境主义、移民、迁徙人群等社会运动;还有意识形态、流行文化等“软实力”都

---

<sup>①</sup>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对于民族国家的实际能力造成了冲击。对于今天的很多社会运动和历史的参与者而言,民族国家所起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无关紧要的,比如说同时具有多重身份认同的离散人群(Diaspora)。

这些新形势造成了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根本任务和功能的反思。新的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形势促使历史学家们重新审视旧的民族国家的疆界、同时拷问传统国别史的范围。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的研究对象、角度和边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世界史(world history)、全球史(global history)和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兴起<sup>①</sup>。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史成为美国中学和高等教育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在美国大学历史和人文教学中,全球史取代传统的世界文明史、西方文明史也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过去由非洲史、亚洲史等各种非西方历史的专家充任教授的世界文明史课程,现在已经可能由专门的全球史专业的学者担任。在美国的一些高校中,世界史、全球史已经成为了历史学专业的一个独立分支,用于对于硕士和博士生进行该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论的专门训练。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在内的权威杂志发表了关于全球史的激烈讨论的专刊<sup>②</sup>。美国史学家年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也倡导全球史的书评、文章、专著、论文集和系列著作的发表和出版。全球学者们(globalists)更是建立了自己的学术组织——世界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sup>③</sup>。专门的全球史的杂志也应运而生,比如说自1990年以来出版的世界历史学会的专刊《世界史》(*Journal of World History*)和自2006年以来剑桥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史》(*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随着全球史的兴盛发展,全球史学家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也更加强烈。尽管一些历史学家处理的对象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学领域的内容,但是他们却并不自称为中国史家。比如说倡导在全球视野下研究现代中

① 有些学者甚至倡导一种全新的“大历史”(Big History),以宇宙为研究单位,探索非人类中心的历史。Cynthia Stokes Brown, *Big History: from the Big Bang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New Press, Distributed by W. W. Norton, 2007.

② 美国史学界关于美国史的全球化的早期系统讨论,见:Michael Geyer and Charles Bright, “World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 No. 4, Oct., 1995; “The Nation and Beyond.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United States History: A Special Issu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6, No. 3, Dec. 1999;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③ 详情见该协会的官方网站:<http://www.thewha.org/>

国移民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麦克考恩(Adam McKeown)<sup>①</sup>就自认为是全球史家(global historian)。

因为概念本身的模糊和发展变化,学术界目前对于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区别还存在争议。两者共同点是都试图跳出欧洲文明、西方文明的范围,冲击并反思传统的国别史。但两者又有所不同。简单来讲,世界史强调普世文明价值,所以侧重文明史尤其是早期文明观念的比较,常常陷入以西方文明发展的主线为线、价值观为纲的论述轨迹。全球史的研究重点则是全球化,关注的对象是大范围内历史发展的进程。由于全球史考量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的交融与互动,所以在研究中并不将西方发展轨迹视为唯一的规律、或者根本出发点。跨国史的定义更为模糊,使用也更为灵活。“跨”(trans-)本身就包含了多重含义:之中、之间、之外、跨越、超越等等。跨国史在广义上描述各种试图超越政治疆域、国别限制甚至文化差别的研究,强调过去被忽视的、被边缘化的群体和研究对象。

一些倡导全球史的学者认为从世界史到全球史的转变不只是名称的更替,其代表的更是价值观的转变。全球史不是一部西方、非洲、美洲和亚洲历史的简单叠加,而是一部互相连通、互相作用的历史。换句话说,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史并不等于世界史中的中国章节。在方法上跨国史也不简单等同于比较史学,因为比较史学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固定的疆界为前提展开的,而跨国史认为国家之间的疆界并不如传统所认为的那么清晰。跨文化跨地区的人员、信息和知识经常彼此纠葛、渗透,无法划分、局限在疆界当中。同时,全球史并不是单纯的比较民族国家之间的异同,而是研究它们之间的渗透、交流与互动。比如说,过去讲二战只讲欧洲战场,或者再加上对于太平洋战场的简介。现在讲整个世界战场,讨论亚洲和非洲殖民地、非殖民地人民的参与对于二战的影响,以及二战对于殖民地政治和人民的影响。二战不仅是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而且是世界各个地区、国家共同作用的结果。

## 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再到跨国史视野下的现代中国

二战后的60、70年代,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成为美国中国史研究中的主流学派。在“西方的冲击”的叙述中,近现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于西方各种冲击所做出的反

<sup>①</sup> Adam McKeown,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s, 1842—1949,”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 no. 2, May, 1999, pp. 306—337;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Peru, Chicago, Hawaii, 1900—193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应。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内部对于“冲击—回应”理论框架进行了各种直接、间接的反思。代表著作有1989年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sup>①</sup>。柯文提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走向以中国为中心”,也就是“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sup>②</sup>。他强调: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有其内在和独特的规律和过程,中国史的研究不应当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脚、例证、延伸或者是应用。

90年代以来,受到全球化和美国史转向全球史的影响,美国的中国研究出现了从中国中心论到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的趋势。无论是在近十年来的研究出版物,还是在最近的会议论文中都可以发现跨国史方法的自觉运用。学者们试图跳出“冲击—回应”和“中国中心”的框架,以全球史的视角解读中国近现代历史,既不以国家为本看待问题,也不把眼光局限在“西方”与“东方”文明的框架内。换句话说,尽可能地抛弃以民族国家或者文明为基准的中心观,无论是西方中心、中国中心,还是任何预设的、非历史的价值中心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的学者们试图重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考察中国,尤其是将近现代史上超出“中国”范围内的题目进行重新审视,甚至回归国际关系、外交历史、外国对于中国的影响等“传统”题目。在分析价值取向上,传统研究强调西方对于中国的影响,解释路径通常囿于两种模式:一种侧重于现代化对于中国的积极论,无论是基督教、科学还是现代性都对于中国具有长期的积极影响。另一种偏重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消极影响,认为在帝国主义武力扩张和资本主义剥削的背景下,包括传教士和汉学家在内的西方人成为了帝国主义掌控的自觉不自觉的工具。与此相对照的最新的研究显示,也许中国并不是现代化进程中被动的受惠者,也不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新的研究重新审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而不只是单方面的影响,也不局限于简单的积极——消极论的叙述中。我认为这种研究趋势和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从国别史到跨国史的转变,下文举例简述。

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在《世界大舞台:19、20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

<sup>①</sup>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中文版见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sup>②</sup> 同上书,第165页。

eth Century) ①中试图重新解读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起源。过去分析中国民族主义的著作大致局限在两种基本模式之内：一种是在“冲击——回应”模式下考察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如何在西方和日本的影响下产生。另外一种侧重“中国中心”，认为民族主义可以自然地在中国文化内部生成。卡尔提出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的本质不仅仅是冲击的结果，也不只是内部理路，而必须放入整个全球范围内考察；全球范围也不单单是传统的西方中心的世界，也包括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她尤其侧重分析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理解与评论波兰、土耳其、菲律宾、南非、夏威夷和许多今天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地区。比如说，中国知识分子在了解了菲律宾革命之后，开始应用殖民主义和反殖民革命的新的世界观来思考中国问题，并且有意识的将中国的问题和其他人种与地区联系起来。具体来说，他们在试图理解清末政局的时候，受到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主义民族革命的影响，将满清王朝不仅看作是一个腐朽王朝，而且看作是一个殖民势力、一个可以作为民族主义革命的对象。

2003 年何伟亚 (James Hevia) 的力作《英国的课业：19 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②考察了西方如何通过暴力的方式将中国置于殖民世界之中，建构了一种表面没有体制统治但实质上的殖民控制，迫使中国最终接受以欧洲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和世界格局。60 年代以来汉学家研究西方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势力对于中国近现代化的影响的论述中，西方人或是以积极的导师、或是以邪恶的殖民者的形象出现。与此相对应的中国中心论者强调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认为他们在没有完全被殖民化的情况下独立炮制出了中国的现代性。何伟亚有别于上述两种论述，他强调尽管中国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但是“英国的课业”在根本上具有暴力和掌控 (domination) 的性质，其根本仍是殖民主义。他同时揭示出了帝国主义的矛盾：一方面自居为文明的中心，将中国、非西方置于文明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中又使用羞辱、暴力和杀戮等手段进行有效的殖民扩张和统治，同时宣称这些是野蛮的中国人唯一可以理解的话语和方式。

① Rebecca Karl, *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中文版见卡尔·瑞贝卡著，高瑾等译《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8 年。

② James L. Hevia,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中文版见何伟亚著，刘天路、邓红风译《英国的课业：19 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

刘禾在《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sup>①</sup>中讨论的对象是启蒙、进步、现代这些西方文明的核心概念。传统的著作大多探讨这些西方核心概念是否被运用、如何被运用,从而证明是否是普世价值。刘禾另辟蹊径,探讨这些理念在清末民初的具体历史环境下是如何被移植、发展和改变的。她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这些概念是如何在现代中国取得合法性。通过对于“外来语”(loan-word)的分析,刘禾展示了双重、多重翻译的过程和跨语际实践的模式。在另一部著作《帝国的碰撞》(*The Clash of Empires*)<sup>②</sup>中,刘禾将清王朝理解为和英国、法国、美国相对应的帝国主义势力,而不仅仅是与欧洲民族国家冲突的帝国主义受害者。换句话说,也就是将中国放入世界范围内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复杂关系网中,重新看待清帝国的身份地位和意识形态的转变。

这些专著都具有很深的理论层次和复杂性,我在这里无法一一阐释。但就本文的目的来说,这些专著都可以看作是对于中国史范围内两种传统研究范式的反思和超越。他们代表了90年代以来的新的研究趋向,在全球史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在选题、视角、材料上都实现了由“冲击——回应”和“中国中心”向全球史、跨国史的转变。这些革命性的著作所处理的题目大多是经典的题目:民族主义、义和团、翻译、传教士。他们的过人之处不仅仅是应用新材料,扩大讨论范围,而且是从一开始就从全球史的问题入手。这些论著在方法论上凸现跨学科,引入东南亚历史、后殖民研究、文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在结论上,他们的关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现代性结论不仅在中国史内部有所开拓,对于这些世界史范围内的核心概念也有重要的理论贡献。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些论著都传达了一种信息:在讨论中国现代历史的时候,我们很难讨论任何“纯粹的、本质上的中国性”(essential Chineseness)。换句话说,一个孤立的近现代“中国”并不存在。

## 南海与东海:以离散为例

当今史学研究中已经存在许多的跨国界研究的范式,比如地中海、大西

①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中文版见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② Lydia H. Liu,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中文版见刘禾著,杨立华等译《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洋、西域、南海等模式。中国史范围内,南海、南洋在地理与东海相近,又比东海作为研究单元要成熟,可以作为很好的借鉴。南海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主要是福建、广东一带人民因为贫穷、战乱、逃避法律制裁等原因来到今天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地经商、做工,暂居或者长期移民。在19、20世纪的英属马来亚殖民地,华人分为新客和海峡侨生(Straits Chinese)两种。前者多是新近的苦力劳工,而后者则是政治经济上的精英,逐渐成为英国殖民者和华人被统治者之间的桥梁。因为很多代的长期居住,海峡侨生积累了经济、政治上的资本,子女也多在殖民地接受英文基础教育,其中一些被送到英国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19世纪下半期之后,清政府由于自强运动对于西学人才和资金的需要,同时自身在合法性上受到改良党和革命党的挑战等原因,改变了长期以来对于移民存有的消极敌视态度,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海外华侨的条例,并且鼓励他们回国经商参政。因为清政府的鼓励,同时由于殖民地种族歧视的存在,很多华人精英选择受雇于清朝和民国政府,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通过这些商人、律师、医生、教育家等人作为载体,实现了南海地区内部大量的物资、资金和信息流动以及文化交流和观念转换。

这些华人精英中比较著名的有伍廷芳、伍连德、辜鸿铭、林文庆等等。在中国史范围内,我们熟知的往往是他们在中国范围内的身份和活动,比如说外交家、现代医学奠基人、清遗老、厦大校长等等。对于这些人物在英帝国和殖民地的活动以及和它们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我们却知之甚少。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中国中心”的态度;认为他们在“中国之前”或是“中国之外”的活动对于中国史并不相关也不重要。

东南亚华侨历史长久以来也是割裂于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史之间,而且研究也常常被文化中心论所主导。通过南海这个跨国的研究范式,可以开发很多新问题,比如迁徙、华人离散、社会网络、文化交流与观念转换等等。近来历史、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的一个研究热点是离散华人精英的身份认同的问题。“离散”这个概念虽然源自犹太人的被迫迁徙,强调对于故土的回归。但是目前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其他人群,包括华人华侨在内。麦克考恩在1999年《亚洲研究杂志》的文章中就提出从跨国和全球视野下研究一个经常被民族国家历史所忽略的群体——现代中国移民的重要性<sup>①</sup>。

<sup>①</sup> Adam McKeown, "Conceptualizing Chinese Diasporas, 1842—1949,"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 no. 2, May 1999, pp. 306—337; and *Chinese 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Peru, Chicago, Hawaii, 1900—193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在东南亚殖民地出生、接受英式教育的侨生精英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有的效忠于英殖民政府，有的服务于清、民国政府，有的成为东南亚侨领。研究的问题集中于：他们在英国、本土出生地和清朝以及后来的民国之间如何认同？他们究竟是忠实的大英帝国属民、大清子民，还是两者都是或者都不是？法律上如何规定，他们自己又是如何认为？他们对于中国、中国人、中华文化这些新兴概念是如何理解和界定的？生活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之下，他们又是如何参与、应对并且影响这个过程？

个案不同，结论也不同。但是在理论上共同的是不应该存有一国中心、一种文化中心的先见去看待这些人物。不预设他们都具有稳定的中国人的身份，不预设某一些文化认同一定强于其他，不以种族作为决定他们认同的绝对标杆。具体地说，不能因为他们被贴上了华人的标签就预设他们在政治上一定忠于清政府或者民国政府；文化上他们对中华文化就一定比对西方文化更加亲切、熟悉和喜爱，哪怕已经是三代、四代之后的移民后代，他们仍然与大陆保持着一种与生俱来、无法割裂的联系。我觉得这样的预设根源于一种“中国中心”的偏见，而忽略了社会现实。

在课题上，东海可以从南海模式中借鉴的地方有重视跨国家、跨文化人员尤其是离散的活动、流动以及资金、信息、知识的传递和转换，比如朱舜水和郑成功。在理论上，不先见或者预设一国、一地或者一种文化为中心，而是从个案出发，放到具体历史背景中考量。南海与东海作为研究单位当然也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由于它们各自兴盛的时代不同，相关的政治地理实体也不同。比如说殖民主义问题在 19、20 世纪的南海领域是核心，而在东海只有到了日本帝国的建立和侵占台湾、朝鲜之后才凸现。

## 东海作为研究的新范式

相对于传统的国别史来说，“东海”这个概念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具有三方面的优势。首先，它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历史自在的联系，而不因为之后的行政划分造成事物本身的割裂，从而避免历史目的论的误导。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人为划分的疆域和历史人物的活动范围、事物的运行轨迹并不完全一致。以跨国、跨文化的新模式来取代或者补充国家作为基本研究单位，可以帮助还原历史本身的联系。比如说古代、中世纪人对于国家的意识和现代人完全不同。对于一些长期居住、来往于东亚海域的渔民、商人、海盗，他们并不一定自我认同为大清、日本或者朝鲜子民，他们很可能只对他们的宗族、职业或者区域存在有意识的认同感。回归历史自在的联系，而不是加强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对于个人认同如此，对于研究今天所认同的“国家”也是

这样。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人类的政治实体以一种异于民族国家的实体的存在,但是近世琉球却代表了一种有别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实体,一种既无法完全用主权的国家概念概括、又不同于传统朝贡系统中的宗主国的群体认同的存在。作为“东海”领域中的一个复杂的例证,琉球的自主性和复杂多变的认同只有在东亚大环境下,尤其是在它与中国、日本互动的复杂关系中才能得以彰显。

琉球人在种族、语言和文化等方面同日本和中国都有很大的区别,有其独特的特征。1609年萨摩入侵之后,琉球事实上已经被纳入了幕府的系统,但是并不和其他藩处于相同的地位,琉球王国政治身份长期处于模糊的状态。琉球通过一个复杂的贸易和外交网将北京、福州、琉球、萨摩和幕府连接起来。在经济上依赖和日本萨摩的贸易,在政治上又必须称臣于中国。由于琉球地缘政治的特殊性,一方面,琉球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们必须应对日本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另一方面,琉球又面对中国,并吸取了大量的儒家意识形态进行政治统治。这个复杂的形势造成了琉球的政治、经济、文化认同很难被简单地概括。比如说,琉球人遇到中国人说汉语,在和日本人打交道的时候则说江户式的日语。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琉球人的自我认同差异很大,即使是同一时期、同一阶层的琉球人也往往具有多重身份和认同。史密斯(Gregory Smits)的研究表明,想象的琉球共同体是一个各种意识形态角逐的战场,文化单一的国家观念并不存在,琉球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它是一个朝贡体制内部的藩属国;对于德川日本来说它虽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又是外国,是一个幕藩体制内部的“异国”<sup>①</sup>。

其次,东海的研究方法可以让我们开发一些过去在狭窄的国别史中难以或无法很好研究的课题。比如像奴隶贸易、传教士活动、殖民主义、移民之类的课题本身就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也超出了今天所界定的文化宗教的区分。只有在跨国界、跨文化的新模式下才可能进行更为有效的研究。

除了引入新课题之外,使用新角度、新视野也可能在原有的课题中发现新问题,得出新观点。就拿大家都熟知的郑成功(1624—1662)<sup>②</sup>来说,我们所知道的郑成功出生在日本长崎附近的平户,母亲田川氏是日本人,父亲郑芝龙是福建出生的海上冒险家。郑的少年时代在日本度过,七岁时

<sup>①</sup> Gregory Smits, *Visions of Ryukyu: Identity and Ideology in Early-modern Thought and Politic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p. 16—48.

<sup>②</sup> 郑成功在西文文献中通常被称为 Koxinga, 由国姓爷音译而来。

才回到福建父亲身边,开始接受中国古典教育。郑芝龙起先支持反清复明,后来又倒戈。但是郑成功本人却拒绝投靠清朝,率众在广东沿岸抗清,1661年打败荷兰人占领台湾,一直到次年去世。现存关于郑成功的第一手资料相当有限,关于他的知识大多通过后来几十年的他人的撰述而来,其他关于郑成功的故事比如母亲的自杀,他的死亡等细节都难以考证。在传统中国史的语境下,郑成功是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但这样的描述固然确切,但并不能够完全概括历史中的郑成功。多面的郑成功只有置于东亚海域的大环境下才能够更好地理解。

郑芝龙是福建出生的海上冒险家,在澳门学会说葡萄牙语,并且受洗成为基督徒,取教名为 Nicholas Iquan,曾短暂地为荷兰人做过翻译。作为一个跨国的海上人物,他的影响从福建延续到日本。郑芝龙是一个中、日、欧洲人争夺东亚海域的产物。如果没有东亚海域这个大环境,他的海盗生涯不可能发展壮大,他与日本妻子的婚姻和郑成功的出生也都没有可能。

如果说郑成功的出生和东亚海域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那么他的发展、影响以及对于他的历史记忆就更需要在这个环境下理解。在19世纪的欧洲文献中,郑成功大多数是以邪恶的海盗形象出现。郑成功是最早进入欧洲人注意的中国人之一。他从荷兰人手中取得台湾,对于欧洲海上霸权的挑战为他赢得了“海盗郑成功”的称号。最早的欧洲记载有台湾的荷兰前总督 Frederic Coyett 所著 *Verwaarloosde Formosa* (被遗弃的台湾)<sup>①</sup>,1675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其中描写的郑成功是一个野蛮、残忍迫害和屠杀荷兰人甚至神职人员的刽子手。

在18世纪日本文献和民间传说中,郑成功以英雄而非海贼的形象出现。但是与中国叙述有所不同的是,他是一个日本英雄,一个在外国领土上成就了丰功伟绩的日本英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18世纪初江户时代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的《国姓爷合战》。作者总是将郑成功描述为“一个碰巧有中国人父亲的日本人”。如果说中国叙述尽可能低调地处理郑成功的日本血统,日语叙述突出他的母亲的美德对于郑成功的决定性影响。他的日式习惯、举止都成为了郑成功“纯日本特质”的证据。这个论断非常具有代表性,“作为日本人的郑成功”形象在日本非常受欢迎。平户至今还保存着据说是郑成功的旧宅,每

<sup>①</sup> Inez de Beauclair ed., *Neglected Formosa: A Translation from the Dutch of Frederic Coyett's Verwaerloosde Formosa*, pp. 161—169, 转引自 Ralph C. Croizier, *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History, Myth, and the Her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9.

年庆祝他的生日,许多神社仍供奉他为英雄。马关条约之后,日本更是利用日本化了的郑成功作为统治台湾的有利政治资源。日治台湾时期,日本政府大力宣扬郑成功的日本血统,并且宣称其统治其实是在继承“传统”,试图通过郑成功将其对于台湾的殖民统治合理化。

郑成功在 19 世纪以来的台湾被认为是一个英雄人物、岛屿的开创者和台湾移民的先驱。他甚至被神化,并成为民间宗教的一个部分,至今仍受到台湾很多庙宇的供奉。在现代具有很强政治化倾向的叙述中,郑成功的故事象征了只有台湾才真正延续了合法的中国政权。19 世纪清朝叙述中,郑成功成为忠君的代表被清朝政府所表彰,1875 年沈葆楨应台湾士绅请求,在台为郑成功立祠,追谥“忠节”。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话语中,因为反满反帝情绪的高涨,郑成功又以全新的形象出现,成为一个忠于明朝的遗民,一个反满、反清、反西方、甚至反日的民族英雄。在 20 世纪初,他又被神化为一个反抗异族侵略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英雄。当今大陆的主流话语基本延续了这种形象,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虏,是使台湾得以回归祖国怀抱的爱国主义英雄。

海盗头目、贸易商人、日本英雄、冒险家、明遗民、岛国开拓者、中华民族的英雄,郑成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实体中常常以孤立甚至对立的面目出现。郑成功的例子凸现了国别史在解释复杂多面、跨国人物时的局限性。不同政治文化历史背景下对同一个人物的不同诠释,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国家的政治立场决定的,这也往往造成了对于多面历史人物的割裂、分离甚至曲解。相反,如果应用东海模式来研究郑成功,在类似复杂历史人物的研究中引入跨国视角,可以帮我们将他们的多重方面整合起来,产生一个更为完整、贴切和历史性的叙述。

## 问题与挑战

随着资本、人员、知识的快速流动,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在民族国家仍然主导世界政治形态的今天,国别史仍然是重要的研究单位。跨国史并没有取代国别史,而是提供了一种补充与替代,尤其是在研究课题本身就具有跨国界、跨文化的特质的情况下。

东海模式在操作上也面临一些理论困难和实际挑战。例如如何界定东海的内涵、外延和适用性?如果这不是一个行政划分的边界,那么以什么作为标准来划界?谁来划界?在时间维度上,到何时为止?在适用性上,什么样的课题更适合用这个跨国界的新概念来解读?如何处理东海与南海以及与其他地域之间的交流?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同时,资料的繁多和语言多样性

也给研究者造成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在史学的日益专门化的今天,史学专家们如何能够对各个国家的历史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需要多大程度的了解?无论如何,随着更多学者投入到全球史的研究中,加上各地区、各领域学术合作的不断深入,东海与跨国史的方法势必为中国史研究开辟新的方向。